

原罪与承担苦难——关于小说《红字》与话剧《绿帽子》

廖奔

—

问：最近上演的话剧《绿帽子》，引起一些歧异性理解甚至争议，您看后有何感想？

答：把美国 19 世纪作家霍桑的小说《红字》改编为话剧，这是一个不好做的活，改起来难改，演起来也难演。这是因为，作品的内涵有着明确的时代和文化背景限定，要改好它、演好它，还要让中国今天的观众理解并认同它，编创需要越过的跨度比较大。

问：可否再详细阐述一下？

答：首先，小说是在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形成的，是基督教罪感文化的生成物，而我们传统的乐感文化背景缺乏它的生长土壤，因此理解起来就存在着跨距。其次，它体现出 19 世纪美国价值观念的变异：从原罪主义走向人道主义。其中既包涵有西方文艺复兴时代就已经形成的人性挑战神性的主题，又有开发美洲新大陆时期移民们对于新教伦理原则的突破，再加上霍桑身上所体现出来的 19 世纪美国自由精神和人道主义立场。其三，改编的舞台剧要演给另一种文化和时代背景下的观众看，并要求他们理解，而观众多半可以说是到了剧场才遭遇到这个主题，事先完全没有文化方面的准备。

问：你认为应该如何理解《红字》这部作品的含义？

答：通过描写牧师与教民通奸的情节来肯定人性对宗教桎梏的突破，赞美天然人性的合理与美丽，是 16 世纪但丁《十日谈》里早已高高扬起的大旗。19 世纪霍桑的贡献在于，他站在脱离了欧洲传统羁绊的北美新英格兰大陆上，感应着时代观念变革的潮汐，以彻底的人道主义立场构造了故事的奇特结局：人们最终被女主人公海丝特的人格力量感化，竟然一致把以往视为耻辱标志的

红色 A 字当作了荣誉的符号来佩带！传统的伦理立场、对于荣誉与耻辱的体认标准，在这里都被颠翻了个。

问：人们看后一般会认为这个作品是写偷情的，你怎么看？

答：小说里所着重强调的点，并不是男女主人公的偷情，而是在偷尝禁果之后，原罪意识驱使着女主人公的自觉与主动赎罪，不仅赎自己的罪，同时也赎情人和丈夫的罪，赎一切人的罪，体现了她以娇弱之躯独自担载世界苦难的伟大精神。也就是说，海丝特用自己柔弱的肩膀，平静担载了所面对的全部人世屈辱，既担载了情人，也担载了丈夫，还担载了世俗偏见。偷情行为尽管并非光彩，但她的这种担载精神却是圣洁的。而牧师，则由于背叛了上帝、又要在公众面前维护崇高的道德形象，陷于精神分裂的无限痛苦之中，海丝特丈夫的逼迫加剧了他的痛苦。在海丝特人格力量的感召下，牧师最终战胜了自己的虚伪、怯懦与自私，抛弃掉世俗形象和荣誉，向公众公开忏悔，坦承了自己现实的和良心上的罪责，然后释然死去。小说重点表现的，不是偷情本身的事件，而是在偷情的事实形成之后，面对伦理社会的巨大压力，男女主人公所经受的不同精神炼狱生活，而落点落在这一过程对社会良知的启迪上：公众为其原罪的圣洁行为所感化，认识到以往社会耻辱观念本身的耻辱——因为它把人们出于人性会犯的过错当作人类永远的精神炼狱，以此来熬煎、折磨人们的灵魂，已经远远背离了人道主义原则——因而全部悔过。小说结局最终提升了公众以及读者的精神境界。

问：可是舞台效果让观众更加关注于偷情。

答：这恐怕和编创对于作品的理解、剧作的导向性以及剧作的定名有关。刚才说了，原作里偷情仅仅只是一个开场的理由，它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女主人公坦然承受苦难的博大精神，在这种精神映照下，偷情已经成为微不足道的先决条件。如果把舞台表演的注意力集中在这里，就不会有上述误解。我认为，这个戏演出中的难点还不在海丝特而在牧师，演海丝特只要表现出她的坦然、真诚就行了，演牧师则必需表现出他的内心掩饰着巨大的痛苦与矛盾，呈现出他激烈的内心挣扎过程，一直到他最终战胜自己而实现精神解脱，这是需

要深厚舞台功夫的。如果不能充分传达出他的这种内心矛盾，观众或许就更多关注于事件原因，而忽略作品的精神意旨。

我再说一遍。霍桑创造的女主人公海丝特形象，用博大的承受精神担载起人世的苦难，以美丽、善良、自责、承受来还报社会的惩罚，既体现了基督教的原罪精神，又召唤和感化着公众的向善心理。红色 A 字符号最终成为她圣洁人格的象征，是有着作者深刻寓意的。但作品传达的圣洁寓意里并不包含偷情，圣洁的只是主人公勇于担载苦难的灵魂。

需要强调的是，最终社会人群对海丝特和牧师的原谅，把红 A 字视作荣誉而不再是耻辱的象征，是对他们的人格完善所产生的赞颂，但这决不等于对偷情的认同。目前的舞台呈现，大约未能充分传达出这种信息，就这样提交给我们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观众，带来歧异性的理解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问：改编这样一部作品，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意义在哪里？

答：我以为，我们乐感文化的传统里缺乏这种承担苦难的原罪精神，特别是在今天，社会上奢望责张、物欲横流，在这样一种现实环境中，被浅薄和世俗包围了的人们只会分享荣誉与财富，人人躲避责任和道义，我们尤其需要这种担载精神的注入。当然，从文化传播的角度谈，改编也是帮助我们了解西方以及美国社会精神的途径。

问：你如何评价邹星枢改编的剧本？

答：剧本在戏剧化处理方面还是比较好的，成功提炼出一系列戏剧性场景，有机结构成了这台戏。原作的散文化风格浓郁，不容易搬上舞台。剧本传达出了一部分原作的精神意旨，但也添加了一些东西。邹星枢有他自己的想法，希望运用这个题材来表现一些他想要表现的东西，例如讴歌女性、批判男人。但是，我觉得添加却给理解原著设置了障碍。例如，过于强调海丝特为了所爱不惜一切，极度蔑视公众谴责，对于配戴绿帽子根本不以为耻，这就改变了原作内容的开掘，清除了原作中的耻感，而耻感恰恰是基督教原罪精神的基础，也是小说的立基所在。只有让海丝特不断地品尝耻辱而良心自责不已，社会对她的责罚和羞辱才显得那么不合人性，公众才能最终为她的高尚灵魂所感

化。眼下的处理，不是用净化灵魂的手法来感化公众，反是认为责罚不应该，于是似乎成了在为偷情伸张正义。

问：张奇虹导演在二度创作上也下了很大功夫，您觉得她处理得如何？

答：张导的处理在提高剧本的舞台性上有很大帮助，例如处理群众场面、渲染气氛等方面，都做得有声有色。但我认为，她为了增进观众对于事件过程的了解，当然也为了增加可看性，添加上去的男女主人公偷情一场，把原来作品中严肃、沉重而又神圣的氛围世俗化了。原作之所以把这个事件忽略过去，只显示结果，就是为了创造这种氛围，使读者尽快进入心灵净化的过程。舞台上偏偏在这里进行渲染性表演，导引观众去看一场司空见惯的偷情，就把戏的主题扯向了偏离。

问：你认为现在的演出本在立意上与原著有无差别？

答：有，而且不小。我们的创作者总想把事件拉入自己的文化，然后依据自己所熟悉的逻辑进行发挥。例如舞台上通篇都在做着丑化、贬低公众来抬高女主人公的努力，设置出一些在我们周围惯常见到但并非霍桑时代新英格兰社会现象的细节，诸如一位妇人要海丝特从自己裙胯下钻过去等等。他们已经从霍桑笔下社会公德的维护者、冠冕堂皇举止端庄的上流社会人物，堕落为无知的市侩和低俗长舌妇。然而，这样的人由对海丝特的鄙夷最终转为敬重，又能让海丝特感受到什么欣慰！何况他们又怎么能够实现这种转化！公众的文明程度是海丝特勇于担载耻辱的基础，也是鄙夷最终能够转化为同情的基础，这是一种不可更改的文化背景。原著中公众虽然歧视海丝特，但仅限于让她配带红A字作为羞辱，决非像我国文化大革命期间那样直接对对象进行人身侮辱，尽管这一点或许正是引发改编者创作冲动的契机。

问：话剧没有采用小说的结局，你对这种处理怎么看？

答：话剧让海丝特为情人殉情的处理，带有邹星枢的理想色彩，他之所以一开始就把海丝特处理得那样为爱不顾一切，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推向这个结局。原作并没有这么强烈的理想色彩，牧师死去后，海丝特离开了并活得很长，处理得比较现实主义。原作在结束时所要强调的是人们从精神上对海丝特

的接纳，话剧的处理则让爱情掩夺了这一目的，这也是话剧把观众注意力拉向偷情的一个重要原因。话剧里还有一个人没有结局，显得戏剧动作不完整，那就是海丝特的丈夫。小说里丈夫所有行动的支撑力都在于他对于牧师的阴毒报复心理，一旦牧师的崩溃到来，他也就失去了生存的全部价值而死亡。舞台演出删去了这一点，他的形象就没有最后完成。我知道在邹星枢的剧本里还不是这样处理的，邹星枢最后让他欲求戴绿帽子而不可得，但这样就离开原著走得更远。

问：许多人很反感《绿帽子》这个剧名，媒介上对于把《红字》改为《绿帽子》颇有争议，你怎么看？

答：小说原名为 The Scarlet Letter，表面意思是“大红色的字母”，但内涵却很复杂。Scarlet 可译为大红的、绯红的、猩红的，也可译作羞红的，还可译作不贞的、淫荡的、罪孽深重的，这些意义都与内容有关，带有一定的象征性。从内容中知道，这个大红色的字母是 A 字，被新英格兰用作通奸的耻辱象征，强迫女主人公佩带于身上。显然，它是提取了“通奸”（Adultery）这个词的第一个字母，用为缩写。但是，这个字母一旦提取出来，意义可能就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化。因为 A 字是字母之首，大写的 A 字有伟大、杰出、顶天立地、圣洁的内涵。而用 A 字打头的英语词汇里，有许多是褒义词，例如 Able（能干）、Advance（进步）、Admirable（可尊敬的），又如 Angle（天使）、Amorous（爱情）、Art（艺术），甚至还有 America（美国），A 字也可以是这些词汇的缩写字母。而红色的 A 字，又意味着它是用鲜血写成，更是填充进了人性伟大牺牲的人文力量。

综上述，小说取名的意义极其复杂并有象征意义，霍桑在定名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国通常把小说名翻译做《红字》，只画出了一个形象外框，并没有填充内涵，中国人听了会感到莫名其妙。译作“用鲜血大写的 A 字”可能要好一些。

剧本译名作《绿帽子》，采用了中国传统民俗文化里的概念。这个名字比较本土化，与作品内涵有一定联系，观众容易理解，编剧的苦心是明显的。但这个词带有滑稽、世俗、油滑的色彩，与原作要表现的庄严精神正好背道而

驰，意义则固定在偷情，并不能准确传达出作品的深邃涵义，反而容易误导。再加上舞台形象把配带红 A 字符号改为戴绿帽子，而红 A 字符号是可以用作中性饰品的，绿帽子却有着传统的固定含义，无法摆脱耻辱的阴影，因此两者功用不同。

问：这又是一次舞台改编名著的尝试，您以前已就此话题发表过见解，这次有何新的启示？

答：从改编的偏离和观众的误解，再次表明异质文化在传承过程中随时都在发生误读和歧义性承递。这虽然是难以避免的，但它再次提醒我们，在对异质文化产品进行引申发挥时，一定要小心，处处都会出现理解上的陷阱。当然，这不等于说改编没有意义，例如我就从这次行动中得到直接的好处：通过对剧作的反思，凸显出原著的意义，加深了对霍桑以及 19 世纪美国文学意蕴的理解。

原载《文艺报》2002 年 3 月 7 日